

· 政治之部 ·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 (1)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吉 群 文 (6)

全面安排社員生活(人民日报社論)..... (12)

制服勝格里的“黃龍”

——記甘肅省民勤县三雷人民公社的防沙斗争..... 中共甘肅省委人民公社調查組 (14)

人民公社搬来了波阳湖

——江西东乡小璜人民公社移山造海改造自然..... 胡廷棠 刘 捷 蔡方作 (16)

軍 事

全國民兵工作會議..... (18)

一年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等方面立下丰功偉績..... (19)

民 族

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 張 經 武 (20)

从奴隶制度飞跃到社会主义——凉山彝族的昨天和今天..... 王 維 訓 (23)

党的民族政策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光輝胜利..... 楊 复 兴 (27)

人民公社制度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建設的飞跃发展..... (29)

全国少数民族添人增寿..... (30)

妇女工作

高举毛澤东思想的旗帜,进一步发动妇女,为实现1960年繼續跃进而奋斗..... 楊 (31)

关于中印边界問題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应邀赴印举行两国总理会晤

复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的信.....(35)

对外关系

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电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36)

陈毅副总理在芬兰大使国庆招待会上說五項原則和万隆精神必将大放光輝.....(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美国政府阴谋劫夺我国在台湾的

大批珍贵文物的声明.....(37)

制止美国政府的强盗行为.....人民日报評論員(37)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在欢迎安井都会上的讲话.....(38)

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協議会理事长安井郁在欢迎会上的讲话.....(39)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就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

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談話.....(41)

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人民日报評論員(42)

· 經 济 之 部 ·

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意义.....吳 俊 揚(43)

支援人民公社修理农具(人民日报社論).....(45)

树立为农业服务的观点.....中共安阳市委员会(46)

依靠地方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中共忻定县委会(47)

工业·交通

把钢铁生产推向新高潮(人民日报社論).....(49)

全国冶金工业1960年全面跃进誓师评比广播大会.....(50)

工业战线上的“穷棒子社”——昆明風动工具厂英雄創業史.....金南因 黃昌祿(51)

在更好地处理农、輕、重关系的新形势下輕工业的新任务.....郑 戈 桓(5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紡織工业

庆功跃进誓师广播报告会上的讲话.....(58)

中小型企业 在 1959 年中創立丰功偉績 (新华社記者述評).....(59)

連續大跃进中的交通运输事业.....王 首 道(60)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开展一个手工操作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全民运动(人民日报社論).....(63)

这不是小事(人民日报社論).....(65)

把手工操作机械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共青团沈阳市委员会(66)

沈阳大东区鋼球轴承厂白手起家高速度革新技術.....(68)

星火燎原——阜新市实现攪煤机械化的經驗.....蕭 光(69)

农 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蔬菜工作的指示.....(71)

爭取油菜大丰收(人民日报社論).....(71)

大牲畜要有一个大发展(人民日报社論).....(72)

一定办好两百万个养猪場(人民日报社論).....(74)

养猪业对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大意义.....司 馬 农(75)

养蜂业在国民經济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李 俊(78)

貿 易

商业工作在提前三年完成五年計劃中的作用.....曾 傳 六(80)

更快地更好地供应农业生产資料(人民日报社論).....(82)

· 文化之部 ·

教 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业余教育委员会的通知.....(83)

农业中学創辦二周年.....陆 定 一(83)

农业中学的第二年.....	欧阳惠林(84)
駿馬添双翼——增田紅专学校調查.....	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工作組(87)
大办“鉄民校”的初步經驗.....	福建省教育厅(92)

文字改革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吳玉章主任給山西省推行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話

万荣現場会議的賀电.....	(98)
加快扫盲进度, 杜絕复盲道路.....	李明(94)
两年来的注音扫盲工作.....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宣傳聯絡处(95)

卫生

全国卫生工作呈現新面貌.....	(97)
------------------	------

科学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主导.....	周培源(98)
海洋地质学及其主要問題.....	梁元博(101)
海洋的成因和地球的起源.....	梁元博(108)
1960年全国地理学术会議总结.....	竺可楨(105)

文艺

继承和发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战斗傳統.....	刘绶松(109)
为电影事业的繼續大跃进而奋斗.....	夏衍(113)
和时代一同前进的美术創作.....	蔡若虹(115)
論曲艺音乐的发展.....	吕驥(118)

· 国际之部 ·

反对日美軍事同盟

高举独立、和平、中立、民主的旗帜繼續前进.....	野坂参三(121)
---------------------------	-----------

苏联政府就日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再次给日本政府的备忘录.....	(123)
---------------------------------	-------

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部长会议直属中央统计局关于 1959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

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124)
------------------	-------

波、德、捷、匈、罗、保、阿、蒙、朝、越等国 1959 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

执行结果的公报(摘要).....	(132)
------------------	-------

波兰人民跨进了新的一年.....	張家驥(136)
------------------	----------

“暴風雨式”前进的第一年.....	張辛民(138)
-------------------	----------

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楊翊林海(139)
----------------	-----------

跑在时间的前面.....	王崇杰(141)
--------------	----------

加速前进的步伐.....	魏凌冰(143)
--------------	----------

保加利亚在高速前进.....	燕青(145)
----------------	---------

向三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迈进.....	蓬輝(147)
-------------------	---------

千里馬飞奔在时间前面.....	王玉章(149)
-----------------	----------

国际经济

1959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特征.....	施景朱(151)
-----------------------	----------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	(157)
------------------	-------

国内外大事记.....	(183)
-------------	-------

报刊参考资料索引.....	(186)
---------------	-------

更正.....	(70)
---------	------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

“人民日报”编者按：如何看待新生事物，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区别之一。为了帮助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现在我们选录了一部分材料，供读者参考。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根据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把握，认为新生事物是一定要胜利的，新生事物一定会代替旧事物。但是新生事物成长、壮大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严重斗争的过程。在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部分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新生事物应当采取热情对待、坚决保护和积极扶植的态度，而绝不应当采取冷淡、讥讽、指责以至打击的态度。正是基于新生事物必然胜利的信心，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对新生事物的悲观主义，提倡革命的乐观主义。

新生事物一定要胜利

难道穷人的起义会在贫困和贫困的根源消灭以前停止吗？这是不可能的。承认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认全部历史经验。……只有后一种假说才是可能的，也就是，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格；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

（恩格斯：“在爱北莱特的演说”1845年。“马克思全集”第二卷第624—625页。）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全集”第四卷第504页。）

马克思完全相信“宣言”上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终究会获得胜利，他完全信赖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智慧发展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在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发动起来的第一次革命前夜向世界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已经联合成为法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过九年之久。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巩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不过的证明。因为我今天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两洲无产阶级正在包围着自己的战斗堡垒，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在法律上确立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经1889年巴黎工人国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资本家和地主们知

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现在真正已经联合起来了。

呵，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的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全集”第四卷第一卷第5—7页。）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舍不顧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蔑视过去建造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书而斗争的”，1917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377页。）

共产主义者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热情和冷静加以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即冷静地清醒地估计到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扑灭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被击败了；一万五千多德国共产党人，被谢德曼和诺斯克交给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歇斯式的阴谋诡计和挑拨手段杀害了；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正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着。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着；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挑拨和迫害削弱不了它，因循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83页。）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落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崩溃，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也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

級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贅。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76頁。)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这点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预談也只能說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预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正在高山之巅预望着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頁。)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9頁。)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綫，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是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伍有信心，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心甘情愿地跟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前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定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见识短浅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者的錯誤思想，不遗余力，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們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1—1102頁。)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

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次，这一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几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一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頁。)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規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車輪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必将取得胜利。“敲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敌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敌人。他們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1957年。)

新生事物的成长一定要经过斗争

偉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不是漫无目标的人行道。誰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笔直、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圈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間小径，誰认为只有“任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歪曲气，誰就会在实际上常常陷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陷阱，像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維克以及（虽然少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列宁：“給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49頁。)

在我們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願意輕易地死去，它們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搏斗，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

在我們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生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輕易地生长起来的，它們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

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間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間的斗争，——这就是我們的发展的规律。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83—284頁。)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贊成新事物。

(毛泽东：“他們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7頁。)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場斗争，就不能創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

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彻底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它巩固起来。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124页。）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以一种风平浪静的情況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706页。）

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吉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裕，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了。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他们，上面还没有给社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議論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

（毛泽东：“谁说鸡毛不飞上天”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778—779页。）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的第17页。）

必须坚决保护新生事物， 不要怕它有缺点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这样，把人弄死以求摆脱这种不完善状态应该是最合理的了。至少屠戮人在企图扼杀出版自由的时候是这样推断的。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终身处于强迫之中，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们都成了瘸子，那末谁来包庇我们呢？如果我们都躺在摇篮里，那末谁来教育我们呢？如果我们都成了囚徒，那末谁来教育我们呢？

无论是单独的人或是群众中的一分子，生来都是不完善的。De Principiis non est disputandum（原则是没有争辩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由此应当

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的辩论人的逻辑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范围都是不完善的，可见只要有任何一种活动范围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在，那就是说，其中没有一种活动范围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说，人根本没有生存权利。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60—61页。）

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必须采取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往往就是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这一步已经实现得比我们所能期待的迅速得多了，这是主要的一点。至于这个党的最初的纲领还很紊乱，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它打起了亨利·乔治的旗帜，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但也不过是暂时的缺点。群众一定有机会和时间来改进，只有在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时候——不论以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在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能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有所进步，从自己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致个人的信”第193页。）

在我们的工人自1878年起经受了光辉的考验以后，我无条件地相信他们，而且只相信他们。他们正像任何大党一样，不能避免个别错误，甚至可能是大的错误。要知道，群众只是从自己错误的后果中学习，从自身的感受中取得经验，但是这一切将得到克服，而且在我们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都容易得到克服。因为我们的青年真正具有不可摧毁的健康。

（恩格斯：“给施米特的信”，1890年，“马克思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334页。）

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以这种缺乏锻炼来准备当时的活动家们。但是，为了总结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求得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承认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只要任务提得正确，只要有不屈不挠地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末暂时的失利不过是和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经验和组织工作的灵活性，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等于改正了大半！（列宁：“怎么办”，1902年，“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44—345页。）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国“共和国”很快就建立这一点上（“誓为共和国而死”——恩格斯回忆他1848—1849年期间参加争取帝国宪法的战役的情緒时这样写过），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人们大喊大叫，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轻而易举，革命斗争徒劳无益，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的拙劣的智识比较起来，要高千倍，要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

（列宁：“约·菲·莫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

集俄譯本序言》，1907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362頁。）

让安身投靠资产阶级的报刊大声喊叫我们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們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紀一直受压迫，受折磨，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們进行革命是不会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正如我有一次指出的，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們中間腐爛发臭，散坏空气，毒化我們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鮮的、年輕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維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声喊叫我們犯了錯誤，在一百个錯誤后面藏有一个个偉大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显赫的，是隐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就的人們做出来的，因此，这些行动显得更加偉大，更加英勇。

即使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是不合事实的），即使我們每有一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个錯誤，我們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偉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養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經驗来解决社会主义組織的最困难的問題。

在这件工作中，在这个千千万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們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錯誤，都抵得上剗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沒有錯誤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錯誤，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才能学会不要资本家而独立进行管理，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53—54頁。）

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内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现象。渡父新的幼芽软弱，拖着帽子的知識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們应当鎮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其細心地对待它們，尽力帮助它們成长，并“照顾”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第六次旁动”就会起特別重要的作用。問題不在此。問題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新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們战胜梅毒，耐心地試驗了605种药苗，直到找出滿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苗为止，可見要想解决危险性事件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們，也应该具有堅持不拔的精神来試驗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最适当的办法为止。

（列宁：《偉大的策略》，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87頁。）

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現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許我們的机关还不很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問題不在

这里，問題在于已經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上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現在却有了火車头。纵然我們的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已經有了历史上最偉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經創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說我們这班乱七八糟，貧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苦吃，就让它們宣傳去吧，反正世界上所有的工人是向往苏維埃国家的。这就是我們所获得的不可測量的偉大成果。……全部关键在于，我們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靜地分清，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績，哪些是我們还作得很不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需要作多次改造的东西。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66—267頁。）

我們的困难不是衰落中的困难或停滯中的困难，而是增长中的困难，高涨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这就是說，我們的困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根本不同。在美国，当人們談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衰落中的困难，因为美国現在正輕受着危机即經濟衰退。在美国，当人們談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停滯中的困难，因为英国已經有好几年处于停滯状态，即停止向前发展。而当我們談到我国的困难的时候，指的既不是衰落，也不是发展中的停滯，而是我国力量、增长，我国力量的加强，我国經濟的前进。到某某时候前进多少，多制造出百分之几的产品，多播种几百万公顷土地，提前几个月建成工厂、筑好铁路，——这就是我国当人們談到困难时所指的一些問題。所以，我們的困难和英国或美国等国的困难不同，我們的困难是增长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我們的困难是这样一些困难，它們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它們的可能性。这就是說，我們的困难的特点在于它們本身就給我們造成克服它們的基础。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66頁。）

我們要反对那些所謂“病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紳打貴农阶级的錯誤行动。事实上，貴农帮助土豪，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現在多数都变好了。他們自己在那里努力禁賭博，清查匪。农会势盛，地方匪徒禁絕，盜匪潜踪。有些地方匪个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据衡山的調查，貴农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仍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号，籠統地罵“病子”。要解決这“少数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农会整頓紀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傳，对他們本人进行訓練，把农会的紀律整好，决不能隨便派兵捉拿，損害貴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紳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毛澤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23頁。）

必須坚决反对对新生事物的悲觀主义

为了掌握社会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国中等阶级不

是經過了四十八年的、德國中等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年的空前的鬥爭么？在莫斯科的帝制自以為比前此更加巩固的那一時期，不就是中等階級勝利最遲遲的時候么？把革命歸咎于少數煽動者之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騷動的地方，必有一種社會要求為背景，這種要求為陳旧的制度所阻撓，不能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民普遍地強烈地意識到，足以保證立即得到勝利，但一切用暴力壓迫它的企圖，只有使它愈加有力，直到打破它底基礎為止。所以，如果我們是被打敗了，我們就只好得從失手亡國。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1851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頁。）

最後的勝利是不成問題的，不過現在走旁路以及發生暫時和局部的迷途（雖然這本來也是難免的）的可能性將比以前多得多。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應該克服它，而且我們就是為克服它而產生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永遠不會喪失勇氣。

（恩格斯：『給弗·阿·左格爾的信』，1883年。『回憶馬克思恩格斯』第42頁。）

其實，任何人只要多少能夠從歷史上來觀察事物，就一分鐘也不會懷疑，目前的紊亂狀態是過渡狀態，是從旧到新的過渡狀態，是新事物不斷成長的狀態。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的初稿，1918年。『列寧全集』第27卷第192頁。）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最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宏觀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着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宏觀，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宏觀，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03頁。）

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着整個局面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局部，而且要看全個。一個蜘蛛坐在井里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对的，因為合乎事實。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前進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堵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

史紀元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种機。自從盘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千年，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月日七架飛機巡察呢？地下几十万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過不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却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万余里，橫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個省內大約兩百万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种機。它散布了許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內，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痛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墮進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向西結集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美國蔣介石向陝甘邊區的『圍剿』，給党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5年。『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44—145頁。）

遼東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被人稱為『勞牛三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十年間內，『從山上取米』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万万勞苦人民不能在几十年內，由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搭橋，不是迴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生的困難都是可以解決的。

（毛澤東：『書運動手、全党動社』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5頁。）

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佔，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里也包含着勝利，在日本的勝利里面也包含着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

矛盾着的對立的雙方互相爭鬥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里，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條件，爭鬥着的雙方都不會轉化。世界上最願意改變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也有不多。現在美國組織聯合國的多數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員只是暫時的，這個局面总有一天要起變化。中國的窮困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

將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第34—35頁。)

(2月29日“人民日报”)

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群众的偉大創造

吉 群 义

一九五八年，我国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就是在具有五亿多农民的广大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个伟大的变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深远意义的新发展。它不仅使我国找到了一个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同时也使我国找到了一条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我国社会組織形式的这个伟大的新变革，是我国人民群众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根据历史发展的需要所进行的偉大的、光輝的創造。

正如一切人民群众的創造，都有其历史根据和社会根据一样，人民公社这一偉大的創造，当然不是、也不能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我們党在全国解放以后，采取一系列的正确的农村政策，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不断地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生产关系經常适应并且不断促进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結果的体现。回顾一下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人民公社的产生，有着多么深厚的物质和思想基础，经历了多么深刻的酝酿过程。

大家知道，在全国解放以前，占我国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土地上富农，占有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广大农民因为没有土地，不得不受地主富农殘酷的剝削，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这种封建剝削制度，严重地束縛了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农业生产长期以来陷于停滞状态。我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了偉大的积极性，就是农民对于消灭土地的封建占有制度的强烈要求的反映，就是我国生产力迫切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的反映。

还在全国解放之前，党便在各个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在全国解放之后，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少数地区除外），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大约三分之一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党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不是采取自上而下地把土地“恩賜”給农民的办法，而是采取彻底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組織阶级队伍，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办法，平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经过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培育了农民的革命主动性，树立了贫农在农村中的压倒优势。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彻底打倒了，旧的富农经济在实际上被消灭，而富农在农村中的政治影响也消灭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摧毁了严重束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农村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地位比解放

前有了改善，不少貧雇农上升到中农的水平。但是由于生产力和农具不足，大多数农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还有困难。他們了解，在个体經濟的条件下，使生活富裕起来是没有把握的，因此他們有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农村由于个体經濟制度的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天地在发展，一部分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成富农，新富农已經在各地出現。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決議”，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經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決議号召各党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在农村广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第一步是根据过去革命根据地的經驗，在农村中普遍建立和发展互助組（包括临时和常年的互助組）。这种互助組虽然基本上沒有改变个体經濟所有制，生产成果还没有实行共同分配，生产工具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是人与人在劳动中的关系已經和过去不同了。由个体劳动变成了集体劳动，因而生产力就大为提高了，两个人可以顶三个人，甚至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这些互助組开始改变了农民个体劳动的状况，培养了农民集体劳动的习惯。它是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以个体經濟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組織，有的常年互助組已經有了一部分的公有农具和牲畜，积累了小量的公有财产，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因素就更多一些。

随着农村互助組織的广泛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解决集体劳动和个体經濟的矛盾的要求日益迫切地提了出来。当时在农村已經出現的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实际生活中显示出比互助組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这时就把互助組改組为群众易于接受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便成为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步骤。但是，代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部分富裕中农，对此却有很大的抵触情緒。他們还和投机商人勾结起来，囤积粮食，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的粮食购销工作。这些情况，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經日益尖锐起来。为了把小农經濟纳入国家计划經濟的軌道，除了努力促进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外，国家同时还实行了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統购統銷的政策。紧接着，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宣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綫的同时，又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決議”。全国各地根据这个总路綫和这个決議，向广大农民大張旗鼓地进行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这些措施严重地打击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大大削弱了城乡资本主义的經濟联系，迅速地扩大了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陣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从此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从一九五三年底的十万个发展到一九五四年底的六十七万个。这种合作社，参加的户数一般是一二十户，大的有一二百户。社员把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社员只作劳力。收获后，就扣除一定数量的公共积累，其余按社员的土地和劳动多少，分别进行分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更能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很显然的。它是适合我国农村特点的由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的重要过渡形式。采用这种保留半私有制的互助合作形式，可以使农民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产，有利于削弱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使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脱离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觉到突然。同时，采用这种形式也便于团结中农，使他们感到入社以后不会吃亏。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还保留土地分红，但是它统一地使用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并且逐步地把这些生产资料公有化；组织社员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劳动果实。所以它基本上已经不是个体经济，而是集体经济。这是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个体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只要农民走上这一步，继续领导他们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就不很困难了。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群众信心的进一步提高；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反过来要求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革。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半私有制和土地分红，妨碍着扩大再生产，不能充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利于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要求改变这种状况，这时候一个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已经酝酿成熟，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我国多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着重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发展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对实现合作化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纲领性的指示。他号召全党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全力领导这个运动，而不要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广大的农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热烈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全国农村掀起了大海澄清般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冬，除少数地区以外，全国农村就实现了初级合作化以后不久，又实现了高级合作化。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性质，除给社员保留少数的自留地以外，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已都废除，实行按劳分配。

在领导农民实现合作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土地改革后农村的阶级情况，特别是对中农的情况，进行了创造性的具体分析。他指出，农村中还有一些贫农仍然处在困难地位，他们积极地要求实行合作化。同时还告诉我们，在中农这个阶层中，有老中农和新中农的区别，而在新老中农中间又各有下中农和上中农的区别。新老中农原来的贫农，在土地改革以后，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较以前好多了，但是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现在的贫农和新中农中的下中农是农村的半无产阶层，他们比较地不团结

小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而他们是我们党在农村实现合作化的依靠。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在合作化开始阶段是动摇的，其中不少人对于合作化很不满意，有些人总是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贫农、新老上中农中间富裕中农实行和下层表表现出来的。由于贫农、新老上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老上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只要我们相信群众的 majority，相信党的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合作化的胜利。根据这些分析，党在整个合作化的过程中，实行依靠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包括新老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的农村阶级政策。党首先把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贫农和新老上中农按其富裕程度，分批地组织起来，在合作组织中树立起贫农的优势。党在实现合作化的整个过程中，对富裕中农这个阶层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自愿参加合作社的富裕中农，在经济上予以照顾，对他们入社的农具和牲畜，合理折价，逐年偿还；对暂时不愿意入社的，耐心等待，用事实来说服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则进行批评和教育。由于集体经济优越性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绝大多数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是基本上满意的。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情况的创造性的具体分析，和党中央根据这种具体分析所制定的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对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顺利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农村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发展过程证明，我们党从来对农民采取积极慎重而又积极引导他们逐步前进的政策，也说明我们党的这种正确政策发生了如何巨大的效果，它使素来称为私有观念浓厚的农民逐步消除着私有观念，使本来是贫苦获得土地而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农民，最后自觉地自愿地放棄了私有土地，热情地拥护社会主义。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疑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要优越得多。取消了土地私有，使使土地不分彼此地连成一片，可以在比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的范围内，更加合理地组织和安排生产。取消了土地分红，实行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发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这样，它就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高级合作化的一九五六年，一般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较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较个体农民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一九五六年以前的三年，我国共开垦荒地三千六百万亩，共扩大土地灌溉面积五千六百万亩，而一九五六年一年就开垦了二千九百万亩荒地，扩大土地灌溉面积一亿一千万亩。一九五六年我国虽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仍比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增产粮食一百五十四亿斤。一九五七年，我国农村生产力继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高级合作化的实现，同时还大大地教育了我国农民，使他们更加体会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增强了集体观念。这就为我国进一步地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

在一九五七年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整风运动的伟恩，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同时，在农村广泛地进行了两条道路的教育，对于少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总想同合作化较量的富裕中农，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破坏合作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给了坚决的打击。经过这次教育和斗争，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又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布命令修正“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不久，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斗号召。党中央的这些正确的指导，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相结合，在更大的规模上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跃进高潮。人民群众的磅礴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他们迫切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创造前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迹。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成了主人了。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①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的鼓舞下，我国人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干劲，更加高涨。一个排山倒海般的、规模空前巨大的国民经济跃进高潮，便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我国农村的伟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是在这个大跃进中出现的。

二

一九五七年十月，农业生产跃进高潮首先从水利建设方面展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根据我国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跃进就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国广大农村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水利失修，农业生产经常遭受水旱灾害。解放以后，党和政府虽然大力领导群众进行水利建设，兴修了不少大、中、小型水利工程，但是由于那时农村还没有完全实现合作化，因此水利工程的兴修还不得不受到限制。在农村实现合作化以后，几亿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组织起来，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开展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这样，兴修水利就成了我国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先声。

一九五七年十月初，历史上受水旱灾害威胁最大的淮河流域的千万人民，首先举起了大兴水利的红旗。接着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及东北各省的广大群众，也纷纷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利化运动。南方各省因为收获较早，水利化运动兴起较晚，但到了十一月份，也一齐投入了这个运动。到一九五八年的春天，便形成了全国性的、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兴水利的群众运动。当时，全国每天出工兴修水利的人数达到六千三百万人以上，安徽省每天平均出工人数达

一千一百余万人，占全省农业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河南、山东、四川等省为兴修水利而出动的人数也都有七八百万。这个运动使我国的水利建设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新局面。在运动开始以后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全国就扩大灌溉面积三亿五千多万亩，比解放以来八年间增加的灌溉面积还多百分之二十九。到了一九五八年九月份，就扩大土地灌溉面积四亿八千万亩，超过了我国几千年来水利建设的总和。

热情蓬勃的广大农民，在掀起水利建设的跃进高潮之后，势必把这高潮引向全面发展。而水利建设的飞跃发展，在农业生产上也要必然引起一系列的变化。例如：旱地变为水地以后，种植的作物种类就相应改变，复种面积也将增多，肥料需要增加，继之而来的畜牧业也必须相应发展和运输力量必须加强，等等。在水利化高潮掀起不久，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全面跃进高潮，就接踵而来。首先是大量地积肥，然后各地普遍试种双田，接着便迅速地展开了几亿农民参加的、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全面跃进的伟大运动。这个伟大运动，全面地促进了我国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

大兴水利和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全面跃进，迫切地要求改良落后的生产工具，迫切地要求供应机械、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这除了靠国家工业部门供给以外，还需要农村依据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大办工业。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地方的工业产值争取在五年到十年内超过农业生产的号召。在这个号召的鼓舞下，适应农业生产生产资料的迫切需要，随着农村土改改革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又开展了一个规模浩大的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县办工业，然后是乡办工业，接着是社办工业。到了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全国农村就办了三万余个各式各样的小工厂。

在庞大的农业生产跃进高潮中，我国农村生产力迅速地向前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就不适应于生产力的跃进发展了。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新的情况下，发生了新的矛盾。

从规模来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狭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跃进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就曾指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②在一九五八年，我国共有七十四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社只有一百六十户左右，三百多个劳动力，两千多亩土地。这样的状况，就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来看，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哪一方面，都很单薄，不便进行较大的农业基本建设和综合经营。特别是水利建设，往往伴有任务大、时间紧、要求急的特点，唯有集中雄厚的人力物力，才能顺利地组织和完成。小社不但不能单独进行任何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而且还对水利建设有许多限制。江西省九江市附近的江湖地区进行水利建设所遇到的挫折，就是小社多例子中的一个。

江湖地区共有六个高级社，四万二千亩耕地，一万五千余人，是个江水环抱的好地方，它的缺陷是有

半数土地非旱即涝。在高级社时期，乡党委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曾作了一个在全洲挖三条大干渠，四十条小干的根治水害兴办水利的计划。起初六个社的干部都同意这个计划，可是参加第一批工程的三个社，一开工就出了问题。江心社在湖的中部，地势较其他社高，旱比涝重，社员们对蓄水抗旱要求迫切，但却认为自己的地势好，渠道修成后，遇到旱年，水往低处流，自己受益不大，因而积极性不高。梅洲社位于湖尾，地势低，涝比旱重，群众迫切要求开渠排水，但又怕建了渠不顶用，碰上大雨，水排不出，涝害更厉害，因而也打了退堂鼓。只有蒋华社的地势不高不低，受益最多，对这项水利工程的建设最为积极，在听到别的社不干之后，蒋华社的社员说：“他们不干，咱自己干！”可是第一，劳动力不够；第二，钱不多；第三，器材、技术人员少；第四，运材开路要占外社的土地，外社不干。所以他们干了几天就不得不停停下来。一个很好的计划，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小社对农田水利建设不利，对充分利用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发展各项生产也不利。公社化以前，广东普梅市地区和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的情况，就是两个典型的例证。

普梅市地区资源很丰富，但因高级社规模小，人力物力薄弱，无法充分合理地利用当地的这些自然资源。如该山区山上有茂不尽的原始森林，可是十八个社，谁也没有力量去采伐。又如，该山区多，本来可以大搞林业和畜牧业，可是山区人少搞不了，结果大量的香茅、葱竹等，使山里白白烂掉了。再如，该山区多、林木多、小矿产多，可以兴办小型厂矿，可是又因为十八个高级社分散经营，社小力弱，兴办不起来。

卫星社是由原来二十个小型高级社合并组成的。在沒有合并以前，各个社因规模小，不能适应生产跃进的需要。这个矛盾除了表现在水利建设方面以外，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在农业生产方面，山区社和平原社的土壤不同，条件相差很大，因为不能因地制宜，各社的产量相差很大。另外，有的社地多、劳动力少，地种不过来，只能够广种薄收；有的社地少、劳动力多，地不够种，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因此，造成各社农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二、在牲畜改良饲养方面，山区社的牧场大，牲畜少，饲料有剩余，平原社没有牧场，饲料不够用，牲畜的饲养受到限制。三、在植树造林方面，山区就可植林的土地面积大，劳动力不足，不能按时完成绿化荒山的任务，对原有的山林也不能进行很好的管理。平原社虽然有多余的劳动力，但是因可植林的土地面积少，无法大量植树造林。四、在道路的修建、灌溉的开渠、农副产品的加工、安排机械和院等方面，都因社的规模狭小，不能统一安排劳动力，不能统一利用资源，不能统一筹集资金，这些事业很难普遍迅速举办。

总之，无论进行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或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开展农业多种经营，大搞兴办工业，都不是一个高级社所能办到的。

客观需要向人们提出问题，也指示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便提出了“打破界限、乡邻、乡邻，实行大协作”的口号，创造了等价交换、互相支援的大协作的劳动组织形式。这种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一出现，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曾指出：

“就在劳动方法不变的情况下，多数劳动者同时使用，也会在劳动过程的对象上引起革命。”“结合劳动”的结果，在这里，是决不能由个别劳动得到；即使能够，也必须在更长得多的时间，或只能在很小的规模内得到。”“我国人民公社所创造的劳动大协作，就是在大规模的范围里，充分地发挥‘结合劳动’的效能，向自然作斗争中的一种革命。安徽省的水利建设所以能在最初四个月中，完成了近九亿方的水利土方工程，就是靠了大协作。”

这种联合生产的大协作，就地区来说，开始只是在社与社、乡与乡之间进行，后来发展为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大协作。

这种联合生产的大协作，就部门来说，开始只是在水利建设方面进行，继之发展到农业生产建设的各个方面，后来又发展到农村工业建设方面，最后发展成为包括交通运输、物资供应、财政信贷、工具修配、政法公安等各个经济部门和各有关工作部门的全方位大协作。

大协作，往往是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集体劳动，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分工，没有统一的指挥，就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适应这个要求，各地群众提出了“各行各业练成一股绳”、“财政、贸易、金融等部门都要成为农业生产的后勤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口号，创造了把农村各个经济部门互相结合以及粮食和工业、农业相结合起来的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有的地方实行了生产、供销、信贷三社合一；有的实行了生产、供销、信贷、手工业四社合一；有的还实行了包括运输在内的五社合一。不少地方还开始把社、社分立的体制改变为政、社合一的体制。这种种组织体制上的改变，对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跃进，起了极其强大的推动作用，并为以后人民公社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组织体制的形成，作了准备。

生产大跃进，把广大的农村妇女从家庭中召唤出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深入，广大农村妇女提高了觉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搞水利建设和农村生产建设的全面开展，使农村对劳动力的需要大大增加。广大农村妇女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才能满足这个需要；而她们也为汹涌澎湃的生产跃进高潮所激发，急于要出来参加生产劳动。这就又向人们提出了问题，如妇女参加劳动后，做饭做：孩子谁管？年老体衰的家庭成员谁来照料？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能够把广大农村妇女从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以及缝紬组、棉衣加工厂等集体生活服务组织，便应运而生而被创造出来了。我国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妇女劳动力之所以能在一九五八年都参加了生产，生活集体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生活集体化是群众适应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而创造出来的，很快就风行全国了。据统计，一九五八年春天，在河南省出现了公共食堂以后，不到三个月，全省农村就办起了二十六万个食堂。湖北省的荆州专区，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就有一百零七万户农民加入了公共食堂。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国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三百四十万个，各种托儿组、缝紬组三百四十多个，敬老院十五万个。生活集体化，是我国农村生活上一个伟大的革命。

在农村原来已经建立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人

們的生产是集体进行的,现在生活又集体化,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分配方面实行口粮供给制提供了条件。全国各地坚持下来的口粮供给制,就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做到一定的劳动日以后,按照当地的粮食供应标准,供给他们足够的食粮;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小孩,免费供给他们所需的食粮。至于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和独居的社员,在高级合作社的时候,早就当作“五保户”由社包起来,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养老死葬都有指头。口粮供给制的实行,解除了五亿多农民几千年来愁吃愁喝的忧虑,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还应当是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农民生活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口粮。全国农村在实行口粮供给制的同时,很多地区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事实证明,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在农村新的形势下,是合理顺应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在一九五八年夏收时首先在河南、安徽等地出现,到了一九五八年七、八月间,便成了全国多数社采用的分配制度了。这个制度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的出现是我国农民思想觉悟提高的表现,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

在大跃进中,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很多。有些创造,其实在过去不少地方就有了雏形。譬如,就农村各个生产部门统一由社领导的体制和政社合一的体制来说,“三社合一”、“五社合一”和“政社一套人马,两个机构”的事例,早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就出现了。浙江省的嵎峨坞高级社、辽宁省的太阳升社、安徽省的舒茶社、江苏省的长江社等大型的合作社,就是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实行了多社合一和政社合一的制度的。至于临时性的食堂和托儿所,更早以前不少农业合作社在农忙季节就已经举办了。

三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为规模较大得多的组织形式所代替。在一九五八年初,许多地方的群众,提出了并小社为大社的要求。党中央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各地群众的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四月,作了关于小社并大社的指示。指示认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向农业机械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上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必产生许多困难。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合并为大社的合作社是必要的。这个指示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四月份起,一个小型并大社的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到了六、七月份,很多地区就完成了并社工作。合并以后的合作社,社干部数一般都是四五百户至一千户左右。就在这个并社运动中,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新的、偉大的组织形式。

一九五八年四月并社运动开始不久,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一种五六千户至一万余户的特大型合作社,其中最出名的有:河南省遂平县的卫星大社,辽宁省盖平县的太阳升大社,四川省叙永县的龙风乡大社,

福建省闽侯县的城门、下洋、龙江三乡大联社,广东省曲江县的樟市大社,浙江省诸暨县的红旗大队等。这些大社,都是在群众的热烈倡议和要求下办起来的。这里只举嵎峨坞的卫星大队为例。

前面说过,在并社以前,嵎峨坞一带共有二十多个高级社。由于规模狭小,在大跃进中暴露出很多困难,群众纷纷要求合并成一个大队。群众要求并社的意見得到县委同意后,县委表示了同意,并嘱咐他们应先搞好生产。群众就掀起了“搞好生产,迎办大公社”的运动。运动的头三天,完成了八千余亩小麦三类苗的追肥。运动的后七天,又完成了一千亩水稻下秧的工作,消灭了四万余亩小麦的虫害。在完成了这些任务以后,紧接着又掀起了一个积肥、灌淤、消灭四害的高潮,在一个星期内,积了大批的肥料,接种果树七万九千余棵,育苗造林二千五百亩,打了五万四千只老鼠和四万九千只麻雀。在完成了这些工作以后,各社的社员群众在四月十六日的夜间,抬着请求办大社的申请书,敲着锣鼓从四面八方拥向梅店街,向县委请求批准办大社。当县委宣布批准他们的请求时,他们高兴极了。四月二十日,开了一个一万五千人的成立大会,宣布了二十个小社合并为一个名叫“卫星”的大社。大社成立后,群众生产热情更高。为了庆祝大社的成立,他们又搞了一个利用闲散地运动,在近百万个鱼鳞坑中,种上了玉米和白薯,在其他闲散地上种起了大麻、向日葵、南瓜三百余万棵,并自动地向社投了五万余元的生产资金。他们說:“小社小富,大社大富,好日子就要来到了!”

这种大社的成立,立刻吸引了各地群众的注意,很多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自动地跑到这些大社参观学习。单是到河南省嵎峨坞和七里营等大社参观的就有几万人。这种参观学习,大大地促进了各地“大社”的产生和发展。

这些在人民群众的热烈倡议和要求下办起来的大社,虽然除了浙江省诸暨县的红旗大队叫“公社”以外,其他都叫“大社”、“联社”或“农庄”,但实际上已经是不同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了。

这种大社在规模上不仅远远大于过去一般的高级社,而且也大于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出现了的两三千户的大型高级社。由于社的规模扩大,集体所有制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公有化的水平也相应提高。过去各自经营的小集体变成了有统一领导的、大規模的有机的整体,同时,这些大社一般都都集中了上述大跃进中群众的一系列创造。这种组织形式是由广大农民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因而它必然具备着很大的优越性和无穷的生命力。例如,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下洋、龙江三个乡二十三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一个多月就买了六十六部双轮双铧犁;修筑了可通汽车的田间干路和板路七十八公里;有新妇地修了灌溉渠道山塘三十八处,七一修整了灌溉渠道,把原抽水机站的灌溉能力提高了一倍多,使全社一万二千亩土地全都受到了灌溉;平整了一些不必要的田埂,改掉了一些小而不利的渠道,扩大了水田一千亩;超额完成了积肥任务,使每亩地的用肥量达到了二百担,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两倍;植树五十万株。这些事情是高级社时期好久都办不到的。

毛泽东同志密切地注视着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所作

的各种试验和创造，并且及时地加以总结和提高。在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間，他就指出：“我們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别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群众的要求，科学地总结了人民群众的创造，为我国农村社会組織形式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八月份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视察的时候，又说：“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好”这一指示传到农村后，广大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群众写了成千上万张的人字报、申请书、决心书，请上级党委批准他们办公社。到九月份，河南、辽宁、北京郊区、河北、山西、青海、广西、黑龙江等地，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群众办公社的热情，是难以形容的，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等里的公社办晚了一点，那里的农民群众便成群结队地去参加别处的公社了。例如，河南省商城城关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以前，报名参加公社的是一万八千余户，可是开成立大会的那天，却来了二万四千余户。原来离他们四十多里的六千余户农民，听说商城那天成立人民公社，便自动组织起来，抬着申请书赶来要求入社。总之，把小社并成大社，转成人民公社，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下中农办公社的意志十分坚定，大部分富裕中农也赞成把高级社改组成人民公社。

办人民公社，在全国成了不可阻挡的浪涛。

四

在上述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我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党必须立即坚决地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地完成这个伟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以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議下，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在河北省北戴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我国人民公社之所以出现并迅速地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在飞跃进中，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举办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决议对建立人民公社的方法和步骤，作了一系列积极而又稳妥的规定，着重指出：要在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人民公社，“防止强迫命令”，“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进行试点，然后推广。在“人民公社建好以后，也不要忙于改变原有的各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最后，决议科学地指明了人民公社的性质，并规定了各种重要的制度。决议说：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但是在现阶段“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在“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决议科学地阐述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展示了共产主义的远景。

党的北戴河会议决议公布以后，建立人民公社的风起云涌的高潮，立即席卷了我国整个农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社，合并转组成为二万六千多个公社（以后经过修组，又改组为二万四千多个公社），占全国农户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一亿二千余万农户，都加入了人民公社，实现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亿万人民参加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在公社化运动的初期，由于干部和群众都缺乏经验，曾经出现过某些管理权力集中过多、分配上某些平均主义和某些浪费的现象。为了使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必须及时地克服这些缺点。因此，党中央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又在武昌召开了党的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伟大的决议，从理论上、政策上对人民公社的性质、发展方向、生产方针、分配制度、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原则、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深刻的阐明。根据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着重阐明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联系和区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人民公社在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要作用，以及实行这两个过渡的条件、步骤等重大问题。这个决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武装了我国人民，成了我国人民继续发展、巩固人民公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为了贯彻这个决议和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党中央又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后，全国各地根据会议的决议和党中央其他一系列指示，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进一步贯彻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确定了目前阶段公社的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制，这样，我们就迅速地克服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曾经出现过的某些缺点，使人民公社很快地健全和巩固起来。

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组织形式比高级社具有更大更多的优越性。刘少奇同志说：“有人以为，现在的人民公社还是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那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什么区别，就没有必要组织人民公社。他们看不到，人民公社在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因而二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人民公社里面，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其中所说的农，包括牧、林、牧、副、渔五业），在组织生产的同时又组织生活，实行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的合一，这些都是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尤其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现在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的所有制是部分的；但是，这部分的所有制是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

